

刘恒武 著

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

——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

NINGBO GUDAI DUIWAI WENHUA JIAOLIU



海洋出版社

宁波市浙东文化研究基地课题成果

宁波市文化服务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基地课题成果

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 ——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

刘恒武 著

海洋出版社

2009年·北京

内 容 简 介

宁波在历史上一直是东亚各国文化交融的枢纽,以宁波为始发点的大陆先进文化的外输曾对东亚各国传统文化的演进产生过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亦带有很深的宁波地域文化的印记。本书力求以文化遗存为原点,洞察宁波对外交流的历史实态及其变迁轨迹,同时以文物资料为基点,探讨宁波港口城市空间与地域人文环境的传统特质。书中涉及的文化遗存包括陶瓷、碑刻、古船、绘画以及书籍等遗物,还包括城墙、官署、仓库、祠庙、陶窑、防垒以及码头等遗迹,以宁波地区文化遗存为主,以国外文化遗存为辅,力求全景式地再现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状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以历史文化遗存为中心/刘恒武著. —北京:海洋出版社,2009.5

ISBN 978 - 7 - 5027 - 7479 - 0

I. 宁… II. 刘…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宁波市—古代 IV. K2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7497 号

责任编辑:陈莎莎

责任印制:刘志恒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2009年5月第1版 2009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5.25

字数:260千字 定价:42.00元

发行部:62147016 邮购部:68038093 总编室: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言

Q I A N Y A N



宁波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在地理环境上依山濒海,三江贯流,丰饶富足的沿江平原为地域文化的蕴蓄提供了基础,而便利发达的水上交通又为其保持畅通的跨区域联系创造了条件。在长达 7 000 年的历史长河中,宁波一方面处于大陆先进文化辐射海外的前沿,另一方面又广撷博采,涵育出卓尔不群的地域文化传统,无论是在历史学的语境里,还是在地理学的语境里,宁波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特质。

宁波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情节构成了浙东地域史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也是东亚各国交往史中引人注目的段落。由于处在物流、人流、信息流的交叉路口,宁波在历史上一直是东亚各国文化传播、交融的空间节点,以宁波为枢纽港的大陆先进文化的外输曾对亚洲各国文化的演进产生过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亦带有很深的浙东地域文化的印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上的宁波港市及其浙东腹地兼具了“文化中转”与“文化创生”的双重角色。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已经超越了地域史的范畴,而应被视为亚洲文化传播史的一个重要部分加以把握。

随着 2001 年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申遗工作启动以来,宁波对外交流史研究以及相关文化遗产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首先,宁波长期以来积累的海上交通历史资料以及港城考古资料得到进一步研究和整理,其中的代表成果包括:林士民、沈建国《万里丝路——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出版社,2002 年);林士民《再现昔日的文明——东方大港宁波考古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王慕民、张伟、何灿浩《宁波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史》(海洋出版社,2006 年)。此外,《宁波与海上丝绸之路》(科学出版社,2006 年)论文集收纳了一批有关浙东海交史的最新研



研究成果,内容涉及宁波港城变迁、海上航路开辟、陶瓷与书籍的外输等研究专题。近年来,国外有关宁波对外交流文化遗存的研究成果中,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的论文《港市論——寧波港と日中海事史》(载于《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Ⅲ——海上の道》,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1—34页)以及井手诚之辅的专著《日本の宋元仏画》(至文堂,2001年)最为引人注目。斯波义信论文精辟地论述了宁波港在中日海事史上的角色变迁及其动因。井手的著作对宋元之际输往日本的佛画进行了全面考察,书中涉及宁波佛画的内容占到全书一半以上篇幅,作者对于佛画产生及外输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分析极其精到,对于宁波石板巷、车桥街等佛画创作场所空间位置的特别关注亦富于启发性。

进入21世纪以后,宁波城市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继续得到开展,已完成和正在进行的重要考古项目包括:2001—2002年宁波子城永丰库遗址发掘;2003年宁波和义门瓮城遗址及南宋海船发掘;2006年启动的句章故城(港)考古调查与勘探;2006年启动的浙东沿海水下考古调查等等,这些项目取得的成果也将推动宁波港口都市变迁及其海上交通研究。

历史文化遗存中凝固着最为真实的历史记忆,本书力图以文化遗存作为历史情境再建的台基,同时参考中外文献资料,充分利用近年最新研究成果,对宁波对外文化交流的历程进行一番探讨和思考。全书按时代序列展开考察,书中涵盖的文化遗存包括陶瓷、石刻、古船、绘画以及拓本等遗物,还包括墓葬、城址、官署、仓库、寺宇、街巷以及码头等遗迹,以宁波地区文化遗存为主,以国外文化遗存为辅,力求全景式地再现宁波古代对外文化交流状况。以下为本书各章的内容介绍与说明。

第一章通过水稻遗存、玉器、漆器等考古遗物的跨区域比较研究指出,史前时代的宁波已经与东海、黄海沿岸其他地区拥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宁波地区是早期稻作文化萌芽、发展、繁荣的区域,它地处杭州湾湾口,附近又有舟山群岛作为通往外海的“引桥”,故而极可能是稻作文化通过海路东传的始发之地。此外,杭州湾地区史前漆器、玉器与日本列岛绳文时代同类器物在特征上的共通性,证明了东亚海洋文化交流圈悠久的历史渊源。

第二章对宁波地区青铜时代的土墩墓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坟丘墓进行了比较。笔者认为,中国江南土墩墓和日韩发现的坟丘墓、石棺墓、支石墓分布于环中国东海以及环黄海地区,它们彼此之间的鲜明共性



难以用“偶合”一词简单解释,而应当从人类集团的长途迁移、跨海交流等活动留下的历史踪迹中去进行阐明。

第三章对宁波汉晋胡人堆塑陶瓷器进行了系统考察。笔者认为,宁波地区陶瓷器上的胡人堆塑,反映出汉晋时期浙东地域社会对于殊方人士、异域风俗的接触和认知,汉晋时期正是江浙沿海的海上交通水平大幅提升的一个阶段,南路航线的不断延展大大拓宽了浙东地区民众的地理视野,胡人堆塑陶瓷器正是这样历史背景之下的产物。

第四章论述了浙东越窑青瓷海外输出的历史状况。两晋时期,越窑青瓷开始向朝鲜半岛输出,这亦可被视为海上陶瓷之路的发端。从考古资料来看,东晋至南朝,朝鲜半岛西南的百济政权统治区是越窑陶瓷的主要输出地。唐代以降,越窑陶瓷的外输区域扩大到了日本列岛、东南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地。在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过程中,宁波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六朝时期,宁波地区的句章已经成为浙东海上交通的要津,宁波海滨与长江入海口应当都是陶瓷外输的重要口岸。唐一五代,宁波逐步演进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濒海港城,与此同时,越窑中心产地移至慈溪,兼以鄞州东钱湖窑业的崛起,宁波在越窑青瓷的生产与外销两个方面均占据了龙头地位。另外,伴随着越窑陶瓷实物输出的工艺技术外输,也直接影响了高丽青瓷和日本硬质釉陶器的创烧。

在第五章中,笔者结合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对唐宋明州(庆元)子城、高丽使馆、市舶司、港区、佛画工坊所在街巷等对外交流史迹进行了考察。海运港区的考察是本章的重点,根据笔者的研究,唐代外洋贸易船的主要停靠地在接近三江口交汇处的余姚江西南岸,入宋以后,外洋船港区则转移至东渡门—灵桥一带。

第六章,以最澄明州牒、台州公验及请来目录为基本资料,对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在明州、台州、越州的求法巡礼史实进行了细致探究,同时就唐代的牒、公验等官方出行凭证的拟制、发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七章的研究专题为宋代宁波港口都市空间与佛教美术品对外传播。本章系统考察了日本、美国的著名美术馆及日本寺院所藏南宋宁波佛画,重点针对以金大受、陆信忠、普悦、张思训等人为代表的南宋明州(庆元)佛教绘画艺匠集团的创作场所、作品接受圈以及海外输出年代等问题展开了研究。笔者指出,其画坊集中分布于明州(庆元)罗城东侧灵桥门附近以及城内东南厢一带,这一区块寺院林立,佛教文化氛围浓厚,



为画师集团的创作活动及经济生活提供了支持和保障。日藏宁波佛画海外输出的主要时代大致在 12—13 世纪,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是专为异域僧侣及客商绘制,宁波画师集团的创作场所邻近宁波东渡门—灵桥港区,其作品极易为海外人士认知和获得。宁波佛画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的局限、赢得更为广阔的传播空间,除了其突出的艺术价值之外,与宁波港口城市在地域文化外输上的巨大优势有着直接关系。从根本上来说,佛教美术品对外输出的最终结果,即是美术品所承载的特定文化的外输。

第八章分节考察了日本京都东福寺旧藏苏轼书《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宋高宗书《明州阿育王山佛顶光明塔碑》、宋孝宗书《太白名山四字碑》、孝宗书《御制碑》、孝宗书《和灵隐长老偈碑》、道潜书《景德寺转轮藏记》以及范成大书《赠佛照禅师诗碑》等一批宋代碑拓。这批碑拓系南宋晚期日本入宋僧圆尔辨圆携回日本的宁波阿育王寺和天童寺碑刻拓本,对于相关史实核证及两宋书法的海外影响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第九章以宁波天一阁旧藏三块旅日宋人刻石为切入点,对日本博多宋人聚居地以及在日宋人的活动进行了探讨。本章指出,旅居日本博多的宋人主要来自浙闽沿海地区,以博多为据点的宋日贸易以及宋商的博多定住,是促进博多区域城市化进程的主因。宋人居留博多,不仅催生了博多商贸的繁荣,也推动了博多文化的兴盛。

第十章首先论述了宋代宁波地区石刻艺术高度繁荣的状况,进而对南宋时期东渡日本的宁波石雕艺匠伊行末及其传人的石刻作品展开了周详的考察。书中搜集到许多留存于日本各地的关于伊派石工活动的遗物资料,其中诸如“狭山池改修碑”、“冈山县高粱市有汉町保月山高云寺址六面石幢”等石刻遗物尚未被国内学界所认知,它们对于研究伊派石工的创作活动及其影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第十一章以新安沉船考古资料为中心,论述了元日贸易及寺社造营料唐船的有关问题。在元日贸易中,日本寺社造营料唐船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寺社造营料唐船往往以博多商人为运营主体,造营料船的船主多为华人或中日混血的博多纲司,其贸易活动基本上是以庆元—博多为空间轴线展开,特定寺社营建费用的获得只是其出航名目,贸易活动的实际参与者包括了多个团体及个人。

第十二章对中外交流史上的宁波佛寺进行了专题探讨。在我国与东



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既是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整个浙东作为腹地的港城宁波,不仅是一个中国文化输出和外来文化流入的门户,也是一处文化传承与创生的沃土。就佛教文化而言,一方面,宁波是天台、禅、律等诸宗之学问渊藪;另一方面,宁波在历史上长期都是中日韩三国佛教僧侣共同探究佛法、参研教理的场域。作为江南名刹的阿育王寺、天童寺、开元寺等宁波佛寺,在东亚海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章通过中外相关史料的梳理,试图复原宁波佛教寺院与海外佛教界交流的历史图景。

第十三章论述了15—16世纪宁波文人与日本遣明使之间书画交流的实态。入明以后,宁波成为中日勘合朝贡使船的唯一登陆口岸。因于地利之便,宁波地域文人集团与日本遣明使团往来密切,双方之间诗文书画的酬和答对,构成了明代中国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一道景观。本章以日藏15—16世纪有关代表性书画作品的研究为基础,结合相关文献资料,充分解读文物本身包含的历史信息,进而勾勒出明代宁波文人群体与旅华日本人之间相互交往的历史实像。

第十四章系统考察了宁波沿海明代卫所史迹。明朝开国之初,出于防范倭寇和强化海政的需要,明政府开始在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地沿海构建严密的卫所体系。就分布于现在宁波地区沿海的明代卫所而言,西端有位于今余姚境内的临山卫,下辖沥海所(今上虞沥海镇)、三山所(今慈溪浒山)。向东有观海卫(今慈溪观城镇),下辖龙山所(今慈溪龙山镇)。循海滨向东南可达定海卫(今镇海),定海卫的辖所由北向南依次为穿山所(今北仑穿山)、郭巨所(今北仑郭巨镇)、大嵩所(今鄞州瞻岐镇大嵩)。今象山县境内有昌国卫(今象山昌国镇),昌国卫的辖所由北向南依次为钱仓所(今象山涂茨镇钱仓村)、爵溪所(今象山爵溪镇)、石浦所(今象山石浦所)。本章依据文献史料和考古调查资料对宁波沿海卫所史迹进行了全面探讨。

全书采取以遗物和遗迹为中心、以文献资料为佐证的立论方法,文献运用尽量做到精确、缜密。此外,区域海交史研究必须兼重文化输出地与文化受容地的考察,否则就无法超越地域史的樊篱,因此,本课题文化遗存研究兼及海外,同时注重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期冀本书成果对未来浙东海交史研究能够带来裨益。

目 次

第一章 宁波地区史前遗物与早期东亚海洋文化交流圈	(1)
一、河姆渡文化稻作遗存与稻作的传播	(2)
二、河姆渡文化与绳文文化的漆器和石(玉)饰件	(4)
第二章 宁波地区青铜时代土墩墓与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坟丘墓的特征比较	(12)
一、宁波地区的土墩墓	(13)
二、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的坟丘墓	(17)
三、土墩墓与坟丘墓的特征比较	(20)
第三章 宁波汉晋陶瓷器上的胡人塑像	(26)
一、宁波汉晋越窑器物上的胡人形象	(27)
二、浙东海上交通的发展及外来文化的输入	(31)
第四章 浙东越窑青瓷的海外输出	(35)
一、朝鲜半岛发现的两晋至唐代的越窑青瓷	(36)
二、日本列岛出土的越窑青瓷	(39)
三、世界其他地区发现的越窑青瓷	(43)
四、浙东制瓷业的发达与宁波港的陶瓷外销	(45)
第五章 唐宋明州故城对外交流史迹	(51)
一、子城	(52)
二、市舶务	(56)
三、高丽使馆	(59)
四、港区	(62)
五、街巷	(74)
第六章 最澄明州牒、台州公验及请来目录	(78)
一、最澄明州牒和台州公验	(79)
二、最澄求法目录与明州刺史题记	(84)
第七章 日藏南宋宁波佛画	(87)
一、日藏南宋宁波佛画及其画师集团	(88)
二、其他与宁波有关的日藏宋代绘画作品	(96)
三、南宋明州(庆元)港的佛画外输	(101)
第八章 日本东福寺旧藏宁波宋代碑拓	(104)



一、苏轼书《明州阿育王山广利寺宸奎阁碑》宋拓本	(105)
二、宋高宗书《明州阿育王山佛顶光明塔碑》宋拓本	(107)
三、宋孝宗书《太白名山四字碑》、《御制碑·和灵隐长老偈》宋拓本 ..	(108)
四、道潜书《景德寺转轮藏记》宋拓本	(112)
五、范成大书《赠佛照禅师诗碑》宋拓本	(113)
第九章 宁波藏旅日宋人刻石与博多宋人居留地	(117)
一、宁波藏旅日宋人刻石	(118)
二、博多宋人居留地	(121)
第十章 宋代宁波石刻艺术及其东传	(128)
一、宋代宁波石刻	(129)
二、宋代东渡日本的明州石雕匠师及其影响	(139)
第十一章 新安沉船与元日贸易	(151)
一、新安沉船的船体结构和出水遗物	(152)
二、新安沉船与寺社造营料唐船	(153)
第十二章 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宁波佛寺	(161)
一、阿育王寺	(162)
二、天童寺	(167)
三、宁波旧城城内诸寺	(171)
第十三章 15—16 世纪中日书画作品反映出的宁波文人与日本 遣明使之间的交流	(184)
一、雪舟绘《宁波府城图》和《育王山图》	(185)
二、徐璜《送雪舟归国诗序》	(188)
三、金湜序、袁应骧跋、一枝希维作《山水图卷》	(189)
四、金湜赞《一休像》与张应麒赞《一休像》	(192)
五、丰坊书《城西联句序》及《谦斋记》	(194)
六、柯雨窗题赞《策彦禅师像》及其《衣锦荣归图》	(198)
七、方仕书了庵赞《渡唐天神图》	(200)
八、叶寅斋作序《谦斋老师归日域图》	(203)
第十四章 宁波沿海明代卫所史迹	(206)
一、临山卫与三山所	(208)
二、观海卫与龙山所	(210)
三、定海卫及其下辖诸所	(211)
四、昌国卫及其下辖诸所	(217)
引用图版出处一览	(220)
参考文献	(224)
后记	(233)

第一章

宁波地区史前遗物与早期东亚海洋文化交流圈



从地图上看,黄海和东海是一片被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岛、琉球群岛、日本列岛、朝鲜半岛等地理单元围合起来的辽阔海域,可以称为东亚的“地中海”。事实上,自远古时代开始,黄海、东海周边各地就有了文化上的联系,这种跨海域的文化交流,无疑主要借助海路航行来实现,而黄海、东海海域的洋流与季风则使得长距离航海和漂流成为可能。

宁波位于我国大陆海岸线中部,在东海、黄海海上交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而言,宁波所处的杭州湾地区值得特别关注。正如杭州湾水域的喇叭形状所喻示的那样,杭州湾地区在文化传播史上长期都是中国大陆文化对外输出的门户,同时也是接受外来文化的窗口。东海、黄海周边各地早期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可以从水稻遗存、玉器、漆器以及墓葬等考古学比较研究中得到明晰的阐释。而宁波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则反映出史前时代的宁波已经与东海、黄海沿岸其他地区拥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一、河姆渡文化稻作遗存与稻作的传播

宁波地区余姚江流域是中外闻名的河姆渡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众所周知,河姆渡文化以稻作遗存和干栏式建筑遗存为标志性特征。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可知,河姆渡文化从第1期起就有了稻谷的栽培,这说明宁波地区的稻谷栽培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前。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类遗存最为丰富,在4A文化层棕褐色有机质堆积层中发现了大量的水稻茎叶、秕谷稻壳,其保存之好,数量之多,令世人惊叹。经研究者鉴定,这些遗存属人工栽培稻无疑(见图1-1)。此外,河姆渡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骨、木农具,也反映出河姆渡文化时期作物栽培的发展程度。河姆渡文化的农具以耜为主,多以骨制,也有木制的。一般认为耜是用于翻土整地的农具,耜的发现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耜耕农业已经开始。河姆渡文化第1期还有一种镰形骨器,它们一般以动物肋骨制成,一端呈尖状或圆形,另一端为握柄,器身下侧加工出锯齿,完整器物长度为20余厘米。这种骨器应该是一种用于作物收割的工具。

1982年,严文明在《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一文中指出,稻谷栽培起源



图 1-1 河姆渡遗址 T223(4A 层)发现的稻谷堆积

于中国的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地区^①。这一观点一经提出,即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河姆渡文化丰富的稻作遗存是其论文的主要依据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降,湖南澧县的彭头山遗址^②和八十垵遗址^③先后发现了稻谷遗存,前者的年代被推定为距今 8200 ~ 7800 年前,后者则被推定为距今 7540 ~ 7100 年前,均早于河姆渡遗址第 1 期,两遗址中稻谷遗存的发现使人们将探索水稻起源问题的视线转移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尽管如此,从稻作考古资料的确实性、完整性和丰富性来看,河姆渡遗址对于稻作起源问题的研究依然是至关重要的。至少可以说,包括宁波在内的杭州湾地区,始终是探索原始稻作农业发展史的重点考察区域。

稻谷栽培技术在长江中下游产生之后,渐次向中国南北各地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关于稻作技术向朝鲜半岛的传播路径,从理论上讲,可以由陆路经河北、辽宁传播,也可自山东半岛直接跨海至朝鲜半岛西岸。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的考古发掘^④,证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稻谷栽培技术业已向北传播到了山东半岛。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杨家圈遗址标示着公元前 2000 年稻作北传的最前线。假设稻作技术经

① 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载《农业考古》1982 年第 1、2 期。

②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90 年第 8 期。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垵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96 年第 12 期。

④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报告》,载《胶东考古》,文物出版社,2000 年。



由山东半岛扩散至朝鲜半岛,那么,朝鲜半岛最早稻作遗存的时代应当在公元前 2000 年之后,然而,近年韩国京畿道的牛岛、佳岬里、农所里等地陆续发现了公元前 2000 年左右的稻谷遗存^①。这些资料使人们开始重视稻作技术从长江下游沿海直传朝鲜半岛的可能性。

关于稻作技术传至日本列岛的路线,学界聚讼不决。一部分学者认为,起源于中国大陆的稻作技术经由朝鲜半岛逐渐扩散至日本列岛;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稻作技术自中国江南直接渡海传至日本列岛的可能性更大。迄今在日本发现的能够确定的稻谷遗存晚于朝鲜半岛的同类遗存,另外,朝鲜半岛稻作文化与日本列岛、尤其是北九州地区的稻作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共通性,因此,从考古学视角来看,朝鲜半岛渡来说似乎更具说服力。但是,近年日本学界 DNA 遗传学水稻 SSR 类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日本本地水稻 a、b、c 三类遗传因子中的 a 类很可能来自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本地稻种所欠缺的 b 类遗传因子则应直接来自中国大陆。^② 根据这一研究成果,上述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

宁波地区是早期稻作文化萌芽、发展、繁荣的区域,它地处杭州湾湾口,附近又有舟山群岛作为通往外海的“引桥”,故而极可能是稻作文化东传的始发之地。



二、河姆渡文化与绳文文化的漆器和石(玉)饰件

我国环杭州湾地区与日本列岛是世界上最早生产和使用漆制品的地区。20 世纪 70 年代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的红漆木胎碗是现存最古老的漆器,它出土于遗址第 3 文化层,属河姆渡文化第 2 期遗存,年代距今约 6000 ~ 6300 年。这件漆碗的胎体以整段木块镂削而成,器身为鼓腹、圈足、敛口,通高 5.7 厘米、口径 9.2 ~ 10.6 厘米、底径 7.2 ~ 7.6 厘米^③(见图 1-2)。现存实物虽略有残损和变形,但仍透显出一种厚重、圆润的美感,器表斑驳的红色漆皮则令人惊叹于中国髹漆工艺的源远流长。另外,

① (日)西谷正:《日本の原始農耕と韓国との関係》,载《韓国先史考古学報》2000 年 7 号。

② (日)佐藤洋一郎:《稻の日本史》,角川书店,2002 年,第 104 - 109 页。

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291 页。



根据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报告,遗址第4文化层还出土了个别“器表留有少数黑色涂料”的木筒,第4文化层距今约6500~7000年^①。报告中并未说明所谓“黑色涂料”化学成分的鉴定结果,但国内外一些文献已将这种木筒称为“漆器”^②。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这几件木筒的出土至少说明,对木器表面进行涂装的行为已经流行于六七千年前的杭州湾地区。



图1-2 河姆渡遗址 T231(3B层)出土的红漆木胎碗

河姆渡遗址的漆器考古发现,曾使人们在很长一段时期认为河姆渡是世界漆器工艺的源头。然而,2000年夏,日本北海道南茅部町垣之岛B遗址发现了一件涂红色漆的纤维制品,其年代被判定为距今大约9000年^③。日本的这一考古发现,无疑动摇了杭州湾地区漆器起源说。但是,据此提出某种结论还为时尚早。垣之岛B遗址发现的“涂漆制品”内里材料为纤维,出土时呈薄片状,将其作为漆器工艺业已确立的证据显得比较勉强。此外,遗憾的是,这件遗物已经毁于火灾,无法对其做进一步的考察。尽管如此,垣之岛B遗址“涂漆制品”的发现仍然意义重大,它让我们看到了漆器起源问题的复杂性。根据漆树DNA的测定,日本漆树系日本列岛固有树种,并非移自大陆,从理论上讲,史前列岛居民对于漆树的接触与认知不一定晚于大陆居民。因此,日本列岛与中国江南地区一样,也是漆器探源研究的重要区域。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木胎漆碗,作为一件显示出一定工艺成熟度的漆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144-147页。

② (日)高橋隆博:《江南の漆芸》,载《浙江と日本》,関西大学出版部,1997年。

③ (日)三浦正人:《北海道の漆文化—縄文・続縄文の漆文化》, <http://isikari.genin.jp/kitanokodaisi/kitanojiyomon/urusinobunka/ususinobunka.html>, 2003年。



器而弥足珍贵,目前,这件遗物仍然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的木胎漆器。笔者相信,随着环杭州湾地区史前考古的进一步展开,将会有年代更早的原始漆制品被发现。萧山跨湖桥遗址第3期发掘中,发现了一件厚度约为3毫米的弧形木质残器,这件器物器壁光洁,器表颜色暗红,与黄色内胎形成鲜明对比,有研究者认为该遗物或为一件漆器^①。根据跨湖桥文化的绝对年代推测,这件器物距今约有7000~8000年。

在日本列岛各地,还发现了几件绳文时代前期(距今5000~6000年前)^②的漆器。其中,福井县鸟浜遗址出土的漆梳最具代表性,这件漆梳距今约6000年,年代晚于河姆渡遗址漆碗^③。此外,北海道南茅部町ハマナス野遗址和木古内新道4遗址出土了红漆木胎盆^④,这证明日本列岛绳纹时代前期已经出现了木胎涂漆容器。上述日本绳文时代前期的漆器均为红色漆皮,与河姆渡遗址所出漆器具有共通性。单就木胎漆器而言,迄今为止,我国杭州湾地区发现的遗物要早于日本列岛的同类遗物,但是据此提出某种结论还为时过早。无论如何,两地原始漆器的考古发现,支持了环中国东海各地的跨海交流在远古时代就已存在的推论。

较之史前漆器考古而论,史前装饰性石(玉)器的比较研究更具说服力地昭示出东亚海域远古文化交流的历史可能性。安志敏先生曾举石(玉)玦为例来说明史前长江下游地区和日本列岛之间的文化联系^⑤。玦是一种圆形有孔的小型石(玉)饰件,按照孔径所占器径的大小比例,分为环形玦和璧形玦两种,与一般的小型环形器和璧形器不同,玦的器身剖有一道连通孔径和外缘的缺口,玦也因此得名(见图1-3)。

目前为止,长江下游地区发现的最古的石块出自河姆渡遗址第1期文化遗存,其年代距今大约6500~7000年。河姆渡遗址第1期文化遗存出土6件石块,以萤石、叶蜡石制成。与石块并出的饰件还有璜、珠、管、

① 王心喜:《杭州史前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2页。

② 本文有关日本绳文文化的时期区分及绝对年代参照:(日)佐々木高明《日本史の誕生》,集英社,1991年,第102-110页。

③ 《ウィキペディア(Wikipedia)フリー百科事典》“漆器条”,<http://ja.wikipedia.org/wiki/漆器>;(日)森川昌和:《鸟滨贝冢》,蔡敦达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47-49页。

④ (日)三浦正人:《北海道の漆文化—縄文・統縄文の漆文化》,<http://isikari.genin.jp/kitanokodaisi/kitanojiyomon/urusinobunka/ususinobunka.html> 2003年。

⑤ 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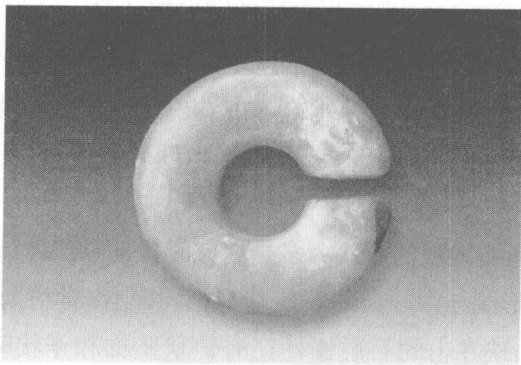


图 1-3 田螺山遗址出土的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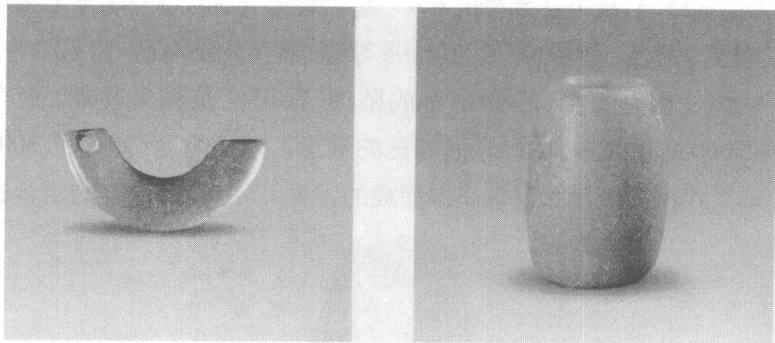


图 1-4 河姆渡遗址第 1 期璜和管

环、斧形坠饰、蝶形器等等(图 1-4),制作材料包括硅质凝灰岩、石英、叶蜡石、萤石,其中还有一件带孔珠以玛瑙制成。^① 河姆渡遗址第 2、3、4 期文化遗存(年代范围为距今约 5300 ~ 6300 年)也发现有玦、璜、珠、管、环一类石质饰件,玦的材质除了萤石、叶蜡石之外,还有石英。^② 河姆渡遗址出土石玦多达 32 件,如果将宁波地区河姆渡文化各遗址所出石玦合起来统计,数字还会翻番。位于河姆渡遗址东北约 7 千米的田螺山遗址中曾发现一个性质特殊的灰坑,坑内出土了一批萤石、燧石制品,其中包括块状原料、管珠块类半成品和燧石质钻具,这些遗物应当是石质饰品加工

①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78-84 页。

②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262-265 页、第 319-321 页、第 355-357 页。